

陈云和周恩来在新中国诞生前后

◆ 宋毅军

陈云和周恩来相识于 1927 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从那以后，陈云多次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可以说，陈云和周恩来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新中国诞生前后，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陈云协助周恩来主管国家财经工作，为稳定经济秩序、巩固新生政权、顺利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周恩来力荐陈云到中央主管国家财经工作

在 1949 年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历史时刻，能不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这直接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成败。

由谁主管新中国全盘经济工作？周恩来想到了陈云。

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周恩来提出：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由于董必武不久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

政府主席，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由他推荐协助自己领导经济工作的助手，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1948 年 5 月，周恩来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命令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赶赴北平分别面见南汉宸、陈云、董必武，听取他们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

陈云认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薛暮桥后来回忆：“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

2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明确指示：请陈云、罗荣桓日内动身来中央一叙。陈云后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林彪、高岗参加了。我留守地方工作，罗荣桓留守军队工作，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之

前，毛主席打电报来，要我和罗荣桓到西柏坡一叙。我们坐吉普车去的，经过保定，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四保临江啊！同周总理也见了面。我说：东北准备了二十万吨粮食，支援平津。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跟在我后面要粮食。周总理说：董必武、薄一波现在搞财经工作，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怕物价继续上涨。我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周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大概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就要我来搞财经工作。

薄一波也回忆说：

中央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同志，周总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总理就对我谈过很多次，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这充分说明总理完全信任和依靠陈云同志。在信任陈云同志这个人才上，可以说，总理起了不小作用。

由此可见，陈云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到中央主管国家财经工作，是经过周恩来力荐、由中央和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陈云

最后决定的。

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陈云没有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因为他急于返回沈阳着手交接工作。中央和毛泽东等到北平后，周恩来连发 4 份电报，催促陈云早日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5 月 3 日，陈云致电中央：“（一）陷（三十日）恩来同志来电悉。高干会后，我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今日起讨论，估计十日前定赶到北平。”“（二）东北局已令曹菊如交代，力争曹与我同去平。”“（三）其他财经干部一时抽不出，可否缓调。”

中央还未收到此电，5 月 5 日，周恩来又致电高岗、陈云，指出，“二中全会前即决定陈云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二中全会后“数电催陈云亦均未得复”，“望陈云同志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这封电报经毛泽东阅后即发，发后再送朱德阅。可见，中央催陈云来北平的急迫之情。

看到陈云 5 月 3 日来电后，周恩来于 7 日再次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辰江（五月三日）电悉。曹菊如应同来，其他财经干部待来后再商调。”同一天，陈云致电中

央报告：“我九日一定离沈赴平，曹菊如尚未交代完，以后赴平再报。”

但实际上，陈云 5 月 13 日才离开沈阳，于 14 日清晨抵达北平。在这四天中，他不仅妥善处理了关于辽东争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 1949 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向东北局作了报告并

获批准。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制订好东北经济发展计划，对陈云准备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周恩来曾提出陈云“带干部速来中央”，而陈云并没有带其他干部进北平。时任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说，陈云“只带了我 1 人及警卫 2 人共 3 人。因为陈云强调，到新岗位任职，应当就地取材，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要引为戒律”。

6 月 4 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暂属中央军委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则归由中央政府领导。

会上，陈云也讲了话。他说：“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随后，他对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作了说明。他说：“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

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为了支持陈云做好国家财经工作，中央同时决定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做陈云的副手，担任委员会副主任。

协助周恩来按党中央、毛泽东要求打击不法投机资本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经济状况对全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工作伊始，陈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上海的经济形势，并指导处理上海的经济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云已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上海解放后“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1949 年 5 月 23 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说：“估计到三个月内购买三万吨左右的棉花，将有四五百亿元的发行，因此可以助长物价若干波动的，但上海纺织之开工与一时苏鄂物价之波动相较，前者利大弊小。同时估计到购棉款散于两省的许多县，并非集中一地。又估计到有了棉花，即可以纱布在市面回笼。总之，利多害少。”

6 月 4 日，华东局财委向中央报告上海银元情况，并提出发动舆论攻势、抛售银元、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六项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

币占领阵地。6月5日,上海市委再次向中央报告银元猛涨严重影响人民币信用的情况,决定采取严厉打击银元投机的方针,提出包括华东财委六项办法在内的五项主张。6月7日,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决定采取断然手段,查封银元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毛泽东获悉情况后亲自回电话表示赞同。

接到华东局电报后,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同银元投机斗争方针及策



陈云、齐燕铭、周恩来在中南海

略的电报稿,拟以中财委名义答复华东、华中。最后,这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00多名证据确凿的银元投机操纵者。这对银元等投机活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7月初,华中局电告中央,提议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三大区金融贸易会议。

陈云赞成华中局提议,并提出在上海召开,请东北、西北方面也派人参加。陈云强调:“由于沪汉两地

是全国经济要地,又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支援沪汉。

7月16日,周恩来批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致华东局并华中、东北、西北财委电: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各区金融贸易会议,并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陈云带领华北财委及中央铁道部同志出席。华中如邓子恢同志不能出席则由范醒之出席。东北、西北出席此次会议,对商讨全盘金融贸易财政问题,均有必要与好处。东北因富春不能离开,故请叶季壮参加。西北则请贾拓夫参加”。“希望在此次会议上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7月19日下午,陈云等离开北平去上海。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指示华东局电报:“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8月17日凌晨2时,毛泽东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陈云何日动身,盼告。”毛泽东还在电文稿上批示:“周阅后即发。再送朱、聂、杨。”

当天,周恩来根据了解的情况,觉得陈云不必急于回北平。他起草了中央给陈云并华东局的指示电,并经毛泽东、朱德审阅发华东局,提出:“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集上海工商业界代表

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周恩来还请陈云对工商业家提出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建议及批评“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接到中央指示电后,陈云与饶漱石、陈毅商定从8月19日至23日分别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海工商界各种代表座谈会,通报财经困难状况,征求对发行公债等对策的意见,号召大家统一思想,共渡难关。中央批准上海会议决定的方针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后,陈云以极大精力落实上海会议的决定。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任副主任。

从隶属中央军委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筹建并开始办公以来,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前后历时半年。陈云对中财委在此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作了这样的概括:“其一,在财政上、物资上支援前线。其二,调拨收购物资供应大城市(首先是上海,其次为天津),力争物价涨度不过猛过快。其三,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财委本身及各部机构的建立。”

11月2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了对全国物价猛涨所采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稳住物价已有可能,半月前希望把物价稳定在九

月底的水平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十月初至今天止，共发行将近八千亿元，我们手内绝无回笼或抵消此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不估计到这一情况，想以少量物资稳住物价，必然消耗了实力，物价仍不能稳住。在目前物价已经涨了两倍的情况下，稳住的可能已经存在，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指示中还明确了向各地下达的 12 条指令。

电报稿起草好后，陈云立刻派人送往中南海西花厅，请周恩来签发。周恩来阅后写道：“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当时，毛泽东尚未入睡。陈云的电报手稿从西花厅送到丰泽园。毛泽东看毕立刻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毛泽东还在“即刻发”三字旁加了着重号。

这两个批示，表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陈云起草的电报内容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显示出他们对处理重大而紧迫事务的果断态度。

当天，电报就下发到各地。一场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制止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立刻在全国打响。到 1950 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毛泽东认为此举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陈云陪同周恩来等访问苏联

1952 年 8 月 17 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随周恩来出访苏联，进行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第二次重要访问。“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苏联政府派遣三架

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

访苏前，陈云一直在考虑怎样争取和合理利用苏联援助问题，并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为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与苏方交换意见准备材料。

陈云认为，从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实际出发，“不失时机地首先恢复东北工业，提高东北工业的生产能力，以便回过头来援助关内，这是合理的。在此时期内，关内则集中力量于修筑铁路，建立电力站，同时进行勘察工作，以便设计若干重要工厂。关内将铁路、电力与勘察设计同时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在路、电通时，即可同时进行建厂。东北与关内的上述分工，符合于两地的工业情况，符合于两年来国家的财力情况，也符合于两地的干部及经济情况”。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落后，连一辆汽车也不能制造。那么，怎样生产制造呢？

陈云回忆：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万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

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

怎样用好外援？陈云在 1952 年 2 月 8 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的信中提出：“今后的方针，一切重要的装备绝不节省地向苏联订，但可以自造的粗货必须自造，以便集中使用外汇，但以确能自造为条件。”“凡能自己做的尽力做，自己能做的而开单子向外国订，那是不守经济纪律，这一条定下之后就组织我们自己的生产力。”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过程中，陈云提出：“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陈云说：苏联对外贸易部通知我们五月份派代表到莫斯科去讨论五年的订货，我们派什么代表去，自己能做多少，摸不彻底，怎么回答？一讨论到供给装备的问题就麻烦。他认为，在当时外汇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什么都想引进，势必会影响重要装备的引进。

1952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5 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提出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研究如何编制 1952 年财政预算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也是在为访苏做重要的准备。7 月 1 日，陈云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五年计划草案准备工作的情况。他写道：“这次我们



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等在一起

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因此，在这一方面花的功夫比较多。在原有工厂的生产方面，也写进去了，但估计这一方面的生产数字一般是低的，可能超过的，将来需要好好再讨论的。所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研究今后五年中新办工厂的原因，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出访苏联前，“我主要的搞工业、搞计划，六月集中搞计划”。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把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问题上。因此，在中财委试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基础上，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等，从而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

8月17日下午，周恩来、陈云一行等抵达莫斯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十分重视中国代表团来访。他们指定莫洛托夫等组成代表团同中国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8月20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

粟裕会见了斯大林，进行了3个小时的交谈。

据会见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的电报说：“在说明我们报告和商谈的程序时，斯大林同志插话并答复问题甚多。提到感谢苏联的援助时，斯说，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橡胶两事上，也是援助苏联。”

“对工业资源的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事，肯定地回答愿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只对专家问题，觉得人数太多，说要按需要派。关于军事装备和军事工业，他强调我们应着重自己生产飞机，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并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单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

8月21日、27日和9月1日，双方代表团主要就延长旅顺口协定期限的换文、中蒙苏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移交中长路的公告、橡胶技术合作等问题进行会谈。关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和请苏联援助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先请斯大林看译好的文件并听取中方报告后，双方代表团再行会商，苏联代表团表示同意。

8月22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随周恩来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8月23日，中国代表团将译好的《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送交斯大林。

8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又将译好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中国国防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送去。

文件写道：“今后五年是中国长

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工业，以改造中国经济面貌和国防面貌，并为农业集体化打下物质基础。”“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其中轻工业以适当发展纺织、造纸、制药工业为主，以适应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对于工业建设速度，文件提出，“根据中国三年来工业恢复的速度，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建设中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速度的完成与超过决定于动员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及技术人员在统一计划之下的顽强的努力和苏联的有力援助。”文件强调，“过去两年的经验说明：中国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在苏联的支援下，是能够边打、边稳、边建的，因此必须争取时间迅速建设，壮大国际力量。”

文件在介绍中国目前准备建设的情况时说：“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今年我们已开始调集一批干部充实中央的财经部门，全国已由各地区抽调了一万余名干部加强各级工业部门及工厂矿山的工作，以后还要有计划地抽调。”此外，文件还介绍了建设资金、地质勘察、设计工作、基

本建设等方面的准备情况。

文件最后请苏联政府“将我们已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任务及主要指标加以审查”，“并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建设规模、时间及有关问题，加以具体的审查”，同时请求苏联在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技术资料等方面提供援助。

9月3日晚，斯大林约中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对这次会谈，周恩来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关于五年计划，斯首先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周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次之，在五年计划中，你们未将民用工业与军事工业和装备计算在一起，这是不应该的。只有将它们放在一起，才便于掌握情况和调度。在你们的材料中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你们什么。据我们自己经验，五年计划至少有一年准备，审查方案还要两三个月。即令如此，也还可能有错误，预先估计到各种情况和困难是不可能的。谈到最后，斯具体指出：我建议工业

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每年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况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关于代表团行动问题，斯问周，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你恐不能留在这里等。周答，我们来时预定我和陈云同志在九月中就要回去，李富春同志和一部同志可留下。”

这次会谈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回到住所进行讨论，认为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对中国三年来的工作是满意的，对中国今后五年计划的设计、装备、专家和贷款提供帮助也是定了的。陈云和周恩来等都认为：“五年建设的速度下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及生产计划每年订在百分之二十上以便留有后备力量，这个意见是极其重要的。”后来，陈云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直把经济计划留有余地作为经济建设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

9月6日，中国代表团将准备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文件交给苏方。8日，中国代表团与莫洛托夫等会谈，请苏方根据斯大林两次谈话及送去的全部文件，例如关于1952年和1953年朝鲜作战所需订货先行审定，五年计划则可以在以后再作回答。

陈云到莫斯科后不仅协助周恩来同苏联政府会谈，而且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联系。9月9日，陈云、李富春致电薄一波、叶季壮，就我国五年的对苏出口计划、国家外汇储备使用、零星设备及器材订货、对苏贸易代表团在苏谈判、聘请对外贸易专家等问题进行沟通和指导。

由于会谈紧张、旅途劳累，9月12日，陈云患感冒病倒了。12日晚，斯大林请从朝鲜赴莫斯科的金日成、彭德怀等吃饭，同时邀请周恩来、陈云参加。陈云因感冒未往。15日，周恩来准备偕陈云、李富春、张闻天会见马林科夫谈党的组织工作问题，陈云又因感冒未能同去。

由于代表团主要任务已经完成，苏联政府决定仍派3架专机送周恩来、陈云一行回北京。原定9月20日起程，因陈云感冒尚未调养好，推迟到9月22日起飞，9月24日返抵北京。

陈云访苏回国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他顾不上休息，又全力投入协助周恩来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准备工作中。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这是对陈云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重要历史时刻所作贡献的最好评价。○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荣辉